

《孙子》译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孙子》译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九二八部队
山西大学中文系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孙子》译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二九二八部队
山西大学中文系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frac{1}{4}$ 字数: 110千字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0,300册

书号: 11088·43 定价: 0.35元

毛主席语录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目 录

读《孙子兵法》(代前言)	(1)
计 篇	(23)
作战篇	(32)
谋攻篇	(40)
形 篇	(48)
势 篇	(55)
虚实篇	(63)
军争篇	(74)
九变篇	(84)
行军篇	(91)
地形篇	(101)
九地篇	(110)
火攻篇	(126)
用间篇	(133)
附录	
关于孙武和《孙子兵法》	(141)
战例十四则	(152)

读《孙子兵法》

（代前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动摇着腐朽没落的奴隶制，推动着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利用奴隶起义的威力，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各国实行变法革新，为建立新的封建制政权而战斗。与此相反，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儒家则为挽救奴隶主政权的灭亡而奔走呼号，惶惶不可终日。以儒法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毛主席说：“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政治搏斗，必然用它的最高形式——战争表现出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这个大变革时期的一个特点。《孙子兵法》正是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产物，是春秋末期大军事学家孙武对于长期以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地分析和评价《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作用，研究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这对

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一步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挖其思想根源——反动的孔孟之道，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孙武的战争观

对于战争，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态度。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在尖锐的斗争中持有截然相反的战争观，执行着截然相反的军事路线。

孙武是十分重视战争的。他在《孙子兵法》中一开头就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可不认真研究。（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不仅看到战争的重要性，而且在战争实践中，积极地探讨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认真地总结了夺取胜利的一般经验。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主张要准备战争，不要寄希望于战争不来，而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人家不来打我们，而要准备好使人家没法打败我们。（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他还看到战争和经济是有关联的，打仗对于经济的损耗很大，因此主张对战争持慎重态度，“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列宁说：“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第二国际的破产》）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正是“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了奴隶主贵族那一整套典章制度，加速发展儒家所哀叹的“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推动着社会的变革。

要求革新、进步的法家是一贯重视战争的。早在孙武之前，著名的法家先驱者管仲就是这样。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改革，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重视战争，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从而使齐国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强大的诸侯国。孙武以后，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商鞅也是这样。商鞅进一步提出要用战争去反对战争，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战争。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鞅并把奖励耕战作为在秦国实行变法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于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起了较大作用，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我们看到，孙武具有鲜明的法家思想，是一位杰出的早期法家人物。在他现存的著作《孙子兵法》中，从他的军事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政治倾向，也可以明确看到，孙武坚持了法家的战争观。

儒家的战争观恰恰相反。他们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政权，总是装腔作势，满口“仁义”，高喊要反对战争。孔老二就扯起“仁义”的破旗，叫嚷什么治理国家要把“礼”放在第一位（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主张“去兵”。卫灵公

向他问打仗的事，孔老二装模作样地说：“礼节仪式方面的事情，我还懂得。军队作战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学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还跑到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那里，花言巧语，要柳下跖“罢兵休卒”，放弃斗争。

孔老二真的反对一切战争，对战争漠不关心吗？不是。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权应当掌握在“天子”——最高的奴隶主头子的手里。诸侯卿相不应掌握军权，奴隶自然更不允许“称兵作乱”。这就是孔老二的逻辑。当郑国的奴隶主贵族用兵镇压了“萑苻之泽”的奴隶起义以后，孔老二拍手称快，胡说什么“政治太宽了就要纠之以猛嘛！”种种事实说明，孔老二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奴隶起义的革命战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的夺权战争和统一战争。对于那些反革命战争，那些残暴镇压奴隶的战争，他是出谋划策，积极参加，声嘶力竭地大造反动舆论的。孔老二的徒孙孟轲说：“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和孔老二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口头上反对战争，实际上进行反革命战争，这是孔老二等儒家之徒惯用的两面派手法，也正反映出没落奴隶主阶级既要垂死挣扎而又极端虚弱的反动本质。儒法两家截然不同的战争观，反映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春秋时期儒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维护或复辟奴隶制的“礼治”，还是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法治。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

阶级纷纷开展以“法治”代替“礼治”的政治斗争。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被迫颁布了成文法（铸刑书）。郑国的法家先驱者邓析利用这一成文法，“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替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打官司。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了刑鼎，颁布了成文法。孔老二为此捶胸顿足地说：“奴隶都可以按照鼎上公布的条文为自己辩护，还怎么能显出贵族的高贵呢？贵贱的秩序都打乱了，还怎么能维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呢？”（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由此可见，“礼治”和法治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尖锐。

作为军事家的孙武，则把“法治”的思想运用到军事上。他把敌我双方“法令孰行？”“赏罚孰明？”作为判断胜负的重要依据。他提出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如果“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就象个骄子，没有用处了。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提出，平素能认真施行法令，教育士兵，士兵就会服从。（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在车战中，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奖励首先缴获战车的人。（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这些，都是建立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武装的有力措施。

据《史记》记载：吴王阖庐为了试验孙武的兵法，答应用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让孙武进行训练。孙武宣布训练规则，三令五申，宫女们嘻嘻哈哈不听军令。于是，孙武按照军法要杀两个队长。这两个队长是吴王的爱妃，吴王急忙下

令不要杀他的妃子。孙武不理睬吴王的制止，终于杀了两个妃子。宫女们严肃起来，进退跪起，队伍训练得完全符合要求。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孙武传》，对这件事有更为具体的记载。

按照周“礼”，国君的意志就是法律，君命就是法令，必须绝对地服从。孔老二鼓吹“君君臣臣”的等级名分，说什么臣对君要绝对“忠”，不能“犯上作乱”。孙武却不听那一套。他严守军法，实行法治，这对儒家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战国时期的杰出法家，都尚法重刑，例如吴起在楚国实行政治改革，提出必须“明法审令”，把奴隶主贵族迁到边远的地方；商鞅在秦国变法，以重法著称，提出“刑无等级”，以赏刑作为“治国举要”的内容。这些主张，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把孙武赏罚严明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赏罚严明，以法治军，一直被后来的法家继承、发展，贯彻执行，成为法家军事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鼓吹“礼治”，在军事上便鼓吹“以礼治军”。孔丘说：“军队中有了周礼，军事就搞得好了”（军旅有礼，故武功成），“好斗而不按周礼行事，就会造反”（勇而无礼则乱）。孔丘反动的政治纲领是“克己复礼”。儒家所谓“以礼治军”，就是要为“克己复礼”而战，士兵要遵循“礼”去行动。这里举几个非常荒诞可笑的例子。有一个鲁国人，跟着鲁君出去作战，三次战斗中三次逃跑。孔丘问

他，他说：“我家有年老的父亲，我战死了没人养他。”孔丘十分赞赏这个“大孝子”，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荐举提拔了他。孔丘的忠实门徒子路，在一次战斗中，正是为了实行“君子”死的时候不能脱掉帽子（君子死而冠不免）这条“礼”的规定，在系帽带的时候，被人砍成肉酱。这是对“以礼治军”的嘲笑和讽刺。照此打仗，只有失地亡国，束手就擒。

尽管孔老二等儒家奔走呼号，要“克己复礼”，“周礼”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以礼治军”，在战场上搞倒行逆施，必然遭到最严厉的惩罚。以“法治”代替“礼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孙武把“赏罚孰明”、“法令孰行”等作为判断胜负的重要依据，实行以法治军的路线，是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客观规律的，在当时具有重大进步意义。后来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便是实行法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成果。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学着儒家的腔调，胡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妄图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而他们自己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极其卑劣的手段，组织反革命特务组织，拼凑所谓“联合舰队”，妄图对革命人民实行最残酷的反革命暴力，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林彪接过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衣钵，大搞他所谓坚定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就是要突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就是继承孔老二的那套“以礼治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其实质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

辟资本主义。林彪和孔老二一脉相承，是一丘之貉

（二）孙武的军事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战争依附于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春秋时期，简陋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能够提供给战争的武器只是戈、矛、戟、剑、弓、矢等，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也只有马车、牛车，战争方式还处于低级的形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战争的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兵车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决定胜负。所有这些较为低级的战争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军事理论的一定水平。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活动，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另一方面，也为建立进步的军事理论构成了相当的客观依据。《孙子兵法》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

孙武的军事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广，这里扼要论述他军事思想中的几个主要特点。

孙武从战争和经济的联系，看到发兵打仗，要耗费大量钱财（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日费千金），他认为当时国家的薄弱经济支持不了长期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战争会使军队疲惫，国家贫困，敌国又会乘机侵入，因此，他不赞成把一场战争拖得很长，主张速战速胜，提出：“兵贵胜，不贵久”。他说：“作战只听说拙笨的速胜，没见过弄巧的持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孙武讲到了迅速地进攻，也讲到了迅速地撤退，尤其强调迅速地进攻。他提倡深入到敌国境内去打，主张乘敌人措手不及，通过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奇袭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武认为，为了实现速战速胜，必须善于机动作战。他反对城寨战，以“攻城”为最下策，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例如修造攻城用的望楼和四轮车，准备各种器械，约三个月之后才能完成；堆积攻城用的土山，又约三个月之后才能堆成。（修橧辘轳，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闾，又三月而后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将领大怒，命令士兵象蚂蚁一样爬城攻城（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其结果，部队伤亡很大，而城仍可能攻不下来，孙武认为，这就是攻城的祸害。（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当时，攻城的器材仅有“钩援”（有钩的梯子）、“临车”、“冲车”、“云车”，以及射不很远的弓弩。这样，攻城必然旷日持久，不可能速胜。要速战速胜，就不能采取城寨战的形式。

孙武机动作战思想的重点在于调动敌人，使敌人处于被动状态，以便战而胜之。他说，攻击敌人必然要去援救的地方，敌人即使想凭借高垒深沟进行固守，也不得不出来同我作战。（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

所必救也。)这就是把敌人从城寨中调出来打。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举孙子兵法为例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

孙武仔细地分析了各种敌情，认为可以采用各种相适应的办法去调动敌人。如：“乱而取之”、“佚而劳之”、“安能动之”、“强而避之”；可以制造一种假象给敌人看（形之），或给敌人以小利引诱敌人，或用计谋去妨害敌人，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这样，使敌人的部队不能互相策应、互相协助、官兵不能互相援救，上下不能互相靠拢，士兵散乱而不能集中，集中了也不能整齐。（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只有这样，才便于控制形势，迅速地战胜敌人，成为敌军的主宰（故能为敌之司命）。

孙武还认为，要速战速胜，必须集中兵力，以实击虚。他认为，即使总的兵力是敌众我寡，只要善于调动敌人，在具体的局部战役中也可以并且必须造成我众敌寡的形势，一举战胜敌人。反之，如果“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就会吃败仗。孙武也不赞成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作战。他认为，胜利的部队就象以镒称铢那样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失败的部队就象以铢称镒那样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镒、铢：古代以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以镒称铢，以铢称镒，都是极言军力之悬殊。）又指出，打仗不是兵越多越好，只要避免轻举妄动，而能集中兵

力,准确判断敌情,争取人心就行。(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孙武认为,只要集中兵力,以实击虚,“并敌一向”,就可以“千里杀将”,取得战争胜利。

孙武认为,要集中兵力,首先要察明敌军的情况,而不让敌军察明我军的情况(形人而我无形)。我方了解敌情,就能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点。敌方不知我情,就势必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我军兵力集中在一处,敌军兵力分散在十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就可以以多胜少。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在作战中掌握主动权,只有集中兵力,才能速战速胜。

提倡灵活变化的作战指挥,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又一特点。它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要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即所谓“因敌而制胜”,“因利而制权”。孙武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这是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实而备之”、“怒而挠之”、“亲而离之”,这是根据敌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通达的地区,要首先占领制高点(通形者,先居高阳),在狭小险要的地方则要守住关口(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还有“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等,都是指根据不同地形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天气干燥、有风,则可以利用天时进行火攻。他说,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出奇制胜的,叫做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其次是要灵活地变换战术。指挥军队有分有合(以分合为变);有快有慢(其疾如风,其徐如林);有动有静(侵

掠如火，不动如山）；乱中有不乱（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也）；既能够“示形”（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来引诱敌人，又能够“隐形”以迷惑敌人。他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向敌人制造假象，使敌人信以为真。（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敌人看不出我军往来的踪迹，听不到我军行动的声息，这样就能够成为敌人生命的主宰（能为敌之司命）。孙武还指出，在两军会战的时候，使用“以迂为直”的计谋，虽然我军迂回绕路，但是只要用小利引诱和迷惑敌人，也能够先于敌人到达必争的有利于作战的要地。

孙武特别强调“奇、正”战法的运用。正，就是根据常规采取一般的战法。奇，就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战法。他说：一般作战，总是以正兵对敌，以奇兵取胜；善于出奇制胜的人，他的方法如同天地那样无穷无际，如同江河那样奔流不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就是说，“奇正”之间这种“战势”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依相生，它们之间的转化就象圆环那样分辨不出头尾。（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在指挥作战中有时用“正”，有时用“奇”。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我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我以“正”击之。

孙武说：“懂得用兵的人，他的行动不会迷失方向，他的措施可以变化无穷。”（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